

# “向远景凝眸”的观照 ——以沈从文昆明时期的《烛虚》为中心

李煜哲  
北京大学中文系

摘要：沈从文在昆明时期（1938-1946）写作并收入文集《烛虚》的长文《烛虚》，展现了沈从文“向外”的建言式写作与“向内”的独语式写作的杂糅。两种写法看似有别，但其背后都被某种“远景”所统摄。这种因“向远景凝眸”而对当前现实产生的“悲悯”观照，将沈从文的建言性杂文中的“理智”与“情感”、《烛虚》与“新烛虚”系列文章中的抽象题记与驳杂正文各相串联，生成了分别作为文集与文章的两个《烛虚》的整体性。

关键词：沈从文；远景；昆明时期；《烛虚》

## 一、“向外”的建言式写作：作为重造能量的“远景”

在沈从文的创作中，“烛虚”作为标题曾被使用过多次：沈从文在《战国策》、香港的《大公报·文艺》等报刊上发表过四篇《烛虚》，这四篇连同另一篇在发表时题名为《时空》的文章在1941年收入文集时，被整合为一篇文章并加以改动而形成长文《烛虚》；此外，1941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文集，同样以“烛虚”为集名。五篇文章的重新整合提示出，单行本中收入的《烛虚》一文内部可能存在一定的裂隙。这种裂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作为整一文章的《烛虚》的内部五节之间在文体层面的差异看出：《烛虚》之第一、二、四节更接近杂文，是一种“向外”的建言式写作，多对现实社会直接批判，发表看法；而《烛虚》之第三、五节则更接近随笔，是一种“向内”的独语式写作，多表现出沈从文对于自己生命境遇与生活心态的观照<sup>1</sup>。而作为文集的《烛虚》中分成两辑的文本，同样呈现出一种类似的“向内”与“向外”的形式区隔——第一辑的四篇《烛虚》《潜渊》《长庚》《生命》，四者标题的形式排列十分整齐，除《烛虚》中的部分小节外，其他都近似于散文诗和独语；而第二辑的四篇分别在《战国策》和昆明《中央日报》上发表过，基本都与文学运动这一话题相关。

初刊于《战国策》上的三篇《烛虚》，正是沈从文在日后所整合的长文《烛虚》

---

<sup>1</sup> 为了表述方便，此处将见于1941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单行本《烛虚》和2009年北岳文艺出版社版《沈从文全集》第12卷中的文章《烛虚》内部以数字“一、二、三、四、五”区分的五部分称为第一、二、三、四、五节，下不另注。

的第一、二、四节<sup>2</sup>。根据沈从文在1941年给施蛰存信中的自述，他参编《战国策》的一个重要动机，在于“希望重建一观念”<sup>3</sup>；而所发表的这三篇《烛虚》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意识与现实针对性，或许也与《战国策》这一发表环境不无关系。解志熙曾指出“《战国策》派时期”在沈从文生命中的特殊性——“那是一个显然偏离了自由主义而接近了民族主义的阶段，一个特别醉心生命一意志一本能的新浪漫主义阶段，一个不再拘守‘纯文学’而走向‘杂文学’的阶段”<sup>4</sup>。解志熙对于沈从文与《战国策》派关系的辩证提示出一个重要观点，即沈从文并不能被视为一以贯之的自由主义者和纯文学作家，因此有必要对沈从文的立场与追求在具体的文本与历史情形中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考察。而发表在《战国策》上的三篇《烛虚》与原刊于文艺副刊《中央日报·平明》和《大公报·文艺》上的另外两节《烛虚》的差异，或许正揭示出了沈从文在昆明时期心路历程的某些驳杂性。

沈从文发表于1940年4月1日《战国策》上的《烛虚》主要讨论了“女子教育”问题。沈从文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五四运动以来改革者对女子教育缺乏计划，在教育设计上没有注意到“男女有别”，导致教育出的女子“很容易成为一种庸俗平凡的类型”<sup>5</sup>，并希望作家能通过创作教育女性的优秀作品来“改造”女性。而在同年10月1日，沈从文又在《战国策》上发表了《谈家庭》一文，再次强调男女有别，与其空洞地追求男女平等，不如寻找男女“合作”的有效形式<sup>6</sup>，而这一“合作”的一种重要实践就是组成令男女双方都感到和谐幸福的家庭。随后10月27日发表在昆明《中央日报·中央副刊》上的另一篇《男女平等》，继续反对“男女平等”的观点，强调男女的生理差异，同样指出解决男女问题的关键在于男女共同组建一个温暖的家。

沈从文的这些关于妇女问题的看法随后遭到严厉批判。1940年11月16日的《妇女生活》上不仅转载了沈从文《男女平等》原作，还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和署名“明先生”的《男女平等与男女差别》一文，质疑与批判沈从文的观点。在《男女平等与男女差别》一文的最后，作者总结道：“在抗建中的我国，男女之间本来只应该携手共同争取我们民族的解放，不应‘独立’或者有什么矛盾存

<sup>2</sup> 《烛虚》第一、二节原载于1940年4月1日《战国策》第1期；第四节原载于1940年7月15日《战国策》第8期，并刊于同年8月19日香港《大公报·文艺》。三篇文章在发表时均题名《烛虚》。而另外两节中，《烛虚》第三节发表时间最早，曾以《时空》为篇名发表于1939年10月28日昆明《中央日报·平明》；《烛虚》第五节则原载于1940年9月14日香港《大公报·文艺》。

<sup>3</sup> 沈从文：《19410203 复施蛰存》，《沈从文全集》第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90页。

<sup>4</sup> 解志熙：《感时忧国有“狂论”——〈战国策〉派时期的沈从文及其杂文》，收入解志熙：《文本的隐与显——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3页。

<sup>5</sup> 沈从文：《烛虚》，1940年4月1日《战国策》第1期，见《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4页。

<sup>6</sup> 参考沈从文：《谈家庭》，原载1940年10月1日《战国策》第13期，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149-150页。

在；但对于妇女问题如果有一种不正确不合时代性的论调，我们无论站在妇女的立场或者民族的立场，都必需加以驳斥的。”<sup>7</sup> 这些批判一直持续到第二年：1941年3月《学习》上发表的一则消息指出，“半年前”沈从文的《烛虚》和端木蕻茜的《蔚蓝中的一点黯淡》等文章在大后方引起了一场关于妇女问题的论战，“至今仍余音袅袅”<sup>8</sup>；而《杂文丛刊》的“战策士”栏目中发表的《“烛虚”和“虚烛”》一文，则讽刺沈从文的《烛虚》是篇“卫道文章”<sup>9</sup>。而可以看到，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大潮中，妇女运动的方向也与对民族解放的追求相呼应。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烛虚》希望作家“写几部新式《青史子》或《列女传》”<sup>10</sup>，还是《男女平等》所谓女性的本能在于“孵卵育雏”、与男子的美满家庭可以成为妇女问题的出路，都成为了一种“倒退”。

事实上，早在1937年至1938年间，沈从文就已经因为“与抗战无关论”而受到左翼的批评，而之后在1941-1942年，沈从文又因介入被认为宣传“法西斯专制主义思想”的《战国策》再次受到左翼批判<sup>11</sup>。然而，对于诸如此类的批判，沈从文却似乎并没有那么在意。尽管自觉地体认到了自己对于战争的思考有些与众不同甚至不合时宜<sup>12</sup>，沈从文却并不动摇。面对纷纷扰扰的论争，沈从文在1940年底发表的《废邮存底——给一个广东朋友》中写道：“若只是成天与二三似通非通的‘文化人’在小刊物上打笔仗，（中略）未免太小觑自己的生命了。既知道有多少吃‘文化人’身份饭的脚色，都似通非通，所以应当将注意点放远一点，奖誉既不以为意，诋毁更不以为意。”<sup>13</sup> 在另一篇《续废邮存底》中，沈从文则建议一个青年作家“向人类远景凝眸，会多看出些东西”<sup>14</sup>。这种目光长远、“向人类远景凝眸”的姿态，可谓贯穿于沈从文整个昆明时期的写作中。在《烛虚》的第一、二节中，沈从文对于如何教育新女性的建议与期许，正是出于他对于战后远景的强烈关怀；在《烛虚》第四节中，沈从文对于战时知识阶级一种短视的人生观感到不满，指出“‘远虑’是人类的特点，但其实远虑只是少数又少数人的特点，这种近代教育培养成的知识阶级，大多数是无足语的”<sup>15</sup>。沈从文不仅将“远景”作为他思考社会问题的支撑性视点，而且认为对“远景”的观照应注入人们的战时生命经验，并最终转化为推动社会和国家进步的行动。

<sup>7</sup> 明：《男女平等与男女差别》，1940年11月16日《妇女生活》第9卷第5期。

<sup>8</sup> 《学习播音》之一则，1941年3月16日《学习》第3卷第12期。

<sup>9</sup> 金不换（陈次园）：《“烛虚”和“虚烛”》，1941年5月6日《杂文丛刊》第2期。

<sup>10</sup> 沈从文：《烛虚》，1940年4月1日《战国策》第1期，见《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9页。

<sup>11</sup> 参考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sup>12</sup> 沈从文：“我想起战争，和别人想的稍有不同。”（沈从文：《狂论知识阶级》，原载1943年3月27日昆明《生活导报》第18期，见解志熙：《沈从文杂文拾遗》，《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2期。）

<sup>13</sup> 沈从文：《给一个广东朋友》，原题《废邮存底——给一个广东朋友》，发表于1940年12月30日香港《大公报·文艺》，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316页。

<sup>14</sup> 沈从文：《给一个青年作家》，原题《续废邮存底》，原载1940年5月1日《战国策》第3期，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320页。

<sup>15</sup>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18页。

在沈从文于同时期《战国策》上发表的对外的建言性文字中，“远景”成功地化身为一种引导人们忍受当前困境、积极建设与改造自我的能量。1940年，沈从文以《续废邮存底》为题在《战国策》上发表了四篇通信，其中都表达了面对战时困难生活处境的积极态度。例如，在第一篇《给一个大学生》中，沈从文就提出希望：“盼你能明白国家的需要，和生命的庄严，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气馁，不灰心。”<sup>16</sup>而沈从文之所以提出如此“不灰心”的要求，是因为无论“建国”还是“做人”，都“包含一种长时期的挣扎和苦战”<sup>17</sup>。这种以“远景”召唤当下生活的信心的态度，也成为了一种有效的规劝方式。这种规劝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沈从文通过“远景”的引入把自己放置在了一个更为超越性的位置，以一个教育者的姿态规劝来信者目光长远、对现实树立信心；而另一方面，沈从文也在用这种“远景”规劝自己——对他人的教育，既由沈从文自己的深思与感悟而来，在某种程度上同样可视为沈从文反身自我而进行的再教育。

昆明时期的沈从文在写作中反复强调文学与作家的重要性，其原因也正在于一种“建国”的“远景”在牵拉。正如发表于同时期的《战国策》并收入文集《烛虚》中的《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一文所言：“一个作家在写作观念上，能得到应有的自由，作品中浸透人生的崇高理想，与求真的勇敢批评态度，方可望将真正的时代精神与历史得失，加以表现。能在作品中铸造一种博大坚实富于生气的人格，方能启发教育读者的心灵。（中略）也许把这个民族的弱点与优点同时提出，好像大不利于目前抗战，事实上我们要建国，便必需从这种作品中注意，有勇气将民族弱点加以修正，方能说到建国！”<sup>18</sup>正是因为坚持“向远景凝眸”，沈从文并不像左翼作家那样视“抗战”为大——沈从文战时社会批评与思考的基本出发点，可以概括为“战胜后要建国，战败后想翻身”<sup>19</sup>；战争的胜利与否并非关键，关键在于如何藉由战争这一时机对国民进行重造，由此为未来的建国准备好有用的人才。

## 二、“向内”的独语式写作与“悲悯”的观照姿态

与《烛虚》的第一、二、四节相比，《烛虚》的第三、五节则呈现出明显不同的面貌。在《烛虚》第三节的开头，沈从文所描述的心境与低沉的天气相互映衬，“这时节实无阳光，仅窗口一片细雨，不成烟，不成雾，天已垂暮”，与他在青岛写《边城》时期的“心若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写作心态

<sup>16</sup> 沈从文：《给一个大学生》，原载1940年5月1日《战国策》第3期，为《续废邮存底》总题下第一篇，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319页。

<sup>17</sup> 沈从文：《给一个大学生》，同上注，第319页。

<sup>18</sup> 沈从文：《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原载1940年8月《战国策》第9期，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51-52页。

<sup>19</sup> 沈从文：《烛虚》第一节，《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9页。

已大不相同<sup>20</sup>。这两节文字中所体现的寂寞、悲哀的心境，以及某种对于生命感到空虚、混乱的精神危机，在单行本《烛虚》首篇文章之后的系列文本《潜渊》《长庚》《生命》中同样有所体现。在这些独语式文本中，沈从文更多地是试图剖析自己，而非用“远景”劝慰自己。

与用“远景”关怀来规劝他人、并潜在返诸自身的建言式杂文不同，在上述内向化文本中，“远景”关怀似乎并未直接催生信念。在诗歌《一个人的自述》中，沈从文质询：“这人间多少人都是/又丑，又蠢，又懒惰，/我心想，‘上帝，你把这群人怎么办？’/上帝说，‘他人的事你不用管。’”<sup>21</sup>对于社会上许多人“无信心、无目的、无理想”<sup>22</sup>的生存姿态，沈从文在其他杂文中同样多有抨击。然而与杂文中多取的批判与讽刺态度不同，沈从文的内向化文本所表露出的，则更多的是一种“悲悯”：“我们这个社会，本来即充满痛苦的现象，许多人间喜剧若从深处看，也都令人油然生悲悯心。”<sup>23</sup>

“悲悯”可谓沈从文昆明时期散文中的重要关键词之一，往往用以描述他对于人世的态度。这种“悲悯”的情感结构早在二三十年代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中就已经可见，如有论者指出，与其他知识分子书写乡村与农民问题所惯用的启蒙者姿态不同，沈从文与乡下人是真正的骨肉相连，他对乡下人的悲悯之心基于他对于乡土人事的深刻理解<sup>24</sup>。王德威在比较沈从文与鲁迅对于“砍头”的写作时，则指出沈从文的独特性在于他是在“寓意”而非“象征”的范畴下书写“砍头”的，少孤愤、乏讥诮的文字白描背后的情感则是“对人世劫噩的大悲悯、大惊悚”<sup>25</sup>。然而“同情”并非“悲悯”的全部，沈从文的“悲悯”实际上内含两种姿态，一是主动疏离，二是站在高处俯瞰众生。“悲悯”意味着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一方面，通过从高处“俯瞰”而发现现实人世的某些消极面，因此而“悲”；同时并不因“悲”生“激”，而是先对那些消极面向报以同情和理解，是为“悯”，但这种“怜悯”的态度仍然暗示出观察者与所观察对象在话语位置上的高下差异。

在《白话文问题——过去当前和未来检视》中，沈从文将“对人生具有深厚同情与悲悯”<sup>26</sup>视为作家勉力写作伟大作品的动力。在沈从文看来，无论是文学

<sup>20</sup> 沈从文：《烛虚》第三节，《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14页。

<sup>21</sup> 沈从文：《一个人的自述》，原载1940年1月26日香港《大公报·文艺》，署名雍羽，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5卷，第207页。

<sup>22</sup> 上官碧（沈从文）：《潜渊》，原载1940年2月17日昆明《中央日报·平明》，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85页。

<sup>23</sup> 沈从文：《谈人》，原载1940年1月1日香港《大公报·文艺》，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131页。

<sup>24</sup> 包晓玲：《乡土流脉与文化选择：沈从文与湘西少数民族作家群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年，第90页。

<sup>25</sup>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41-142页。

<sup>26</sup> 沈从文：《白话文问题——过去当前和未来检视》，原载1940年《战国策》第2期，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62页。

家还是政治家，能称得上“伟大”者必然拥有“悲悯与爱”<sup>27</sup>。“悲悯”首先源于观看，“凝眸人间，我们看到人的活动比较深广时，总不知不觉会发生悲悯心”<sup>28</sup>，“所见既多，转觉人生可悯”<sup>29</sup>。然而，昆明时期沈从文的“观看”与他此前生命中的“观看”方式并不相同。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这样描述自己观照世界的方式：“我就是个想不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不能把我的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中略）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sup>30</sup>如果说早期的沈从文只是单纯地“看一切”，那么可以说战争的情境下沈从文观照的方式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昆明时期的沈从文不仅是“看一切”，而且是“向人类远景凝眸”，是向文明的远方与未来看。贺桂梅指出，沈从文在文集《烛虚》和《七色魔》中的思索，其基本前提可称为“宇宙整体论”：他采用“泛神论”的方式对宇宙万物进行整体性认识，并将自己放置到一种类似于“上帝”的位置上，不仅以此接近、理解万物，而且要以文字再创造这种生命的神性形态<sup>31</sup>。考虑到《圣经》是沈从文重要的思想与文学资源之一<sup>32</sup>，贺桂梅以“上帝”比附沈从文的观照视角也是由来有自。不过，如果从《烛虚》文本内部来看，《烛虚》小序所暗示的《圣经》之“传道者”形象或许比“上帝”的表述更为恰切：沈从文并非全知全能的“上帝”，而更多的是一个关怀并对人类未来有所思索的“先知”。

在这种“先知”姿态下，沈从文对于“抽象”的关怀，在一定程度上就可视为他为重造社会而提出的方向。在《烛虚》第五节中，沈从文就指出“抽象”不仅能激发令人陶醉的生命境界，也是人类生存的重要依托，“人之所以为人，必需有一种或许多种抽象原则，方能满有兴趣的活下去”<sup>33</sup>；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欲望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sup>34</sup>。在另一篇文章中，沈从文认为：“社会的混乱，如果一部分属于一般抽象原则价值的崩溃，作者还有点自尊心和自信心，应当在作品中将一个新的原则重建起来。应

<sup>27</sup> 沈从文：《谈沉默》，原载1945年5月11日《贵州日报·新垒》第24期，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180页。

<sup>28</sup> 沈从文：《谈人》，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129页。

<sup>29</sup> 上官碧（沈从文）：《潜渊》，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86页。

<sup>30</sup> 沈从文：《女难》，收入《从文自传》，上海第一出版社，1934年初版、1935年再版，第105页。

<sup>31</sup> 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3页。

<sup>32</sup> 1942年，沈从文在给易梦虹的一封信中，就把《圣经》与《红楼梦》共同作为学习控制语言的重要参考书：“若写信，想文字亲切而贴近语言，真正可永远师法的一本书，倒是随地可得的《圣经》。新旧约给我的启示即极大，尤其是用文字造风格有以自见，这本书有好些地方俨如在示范。”（沈从文：《1942年致易梦虹》，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20页。）早在1927年，徐霞村在评论沈从文作品集《鸭子》时就指出：“在他的散文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受过《圣经》的影响，除了他的对话的流利和叙述的细腻外，还有抒情的深刻一个特点。它们使我们知道，在著者的天真的面孔后还深藏着深刻的悲哀。”（徐霞村：《沈从文的〈鸭子〉》，《北新》1934年第34期。）

<sup>33</sup> 沈从文：《给一个中学教员》，原为《续废邮存底》总题下第四篇，原载1940年5月1日《战国策》第3期，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325页。

<sup>34</sup> 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66页。

当承认作品完美即为一种秩序。一切社会的预言者，本身必须坚实而壮健，才能够将预言传递给人。作者不能只看今天明天，还得有个瞻望远景的习惯，五十年一百年世界上还有群众！”<sup>35</sup> 从这种将作家与“预言者”相勾连的思考方式中，可以看出沈从文昆明时期的“悲悯”姿态与“抽象”关怀正与他对“远景”的观照相互照应，并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构成了沈从文超拔自我的能量。

钱理群指出，对抽象的生命命题的关注构成了 40 年代相当一部分诗人、小说家的精神与创作特质，并认为这种关注其实反映了作家们对于战乱造成大量政治、经济等社会危机这样的时代性的回应<sup>36</sup>。有研究者将沈从文在其独语式写作所表露出的空虚悲观心态归因于沈从文三四十年代之交深陷危机的个人感情生活<sup>37</sup>，这种考据式的读解固然为我们进入沈从文的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在昆明的心境提供了某种线索，不过却可能遮蔽了沈从文创作心境中更为复杂的面向。即使是在沈从文“向内”的独语式写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对于抽象命题的思索，并没有仅仅限于他的个体生命本身——他仍然身陷与社会的复杂纠葛中，并且无法抑止他对于外界社会的关注。

在此，如果将《烛虚》文集第一辑中所收的四篇文章合并观之，就能够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点。尽管沈从文在《烛虚》第五节中表明“说他人不如说自己”，“记人事不如记心情”<sup>38</sup>，但他所思考的，却并不仅仅是自己的人生，而是生活在广大人群中的自己的人生：“我实需要‘静’，用它来培养‘知’，启发‘慧’，悟彻‘爱’和‘怨’等等文字相对的意义。到明白较多后，再用它来重新给‘人’好好作一度诠释，超越世俗爱憎哀乐的方式，探索‘人’的灵魂深处或意识边际，发现‘人’，说明‘爱’与‘死’可能具有若干新的形式。这工作必然可将那个‘我’扩大，占有更大的空间，或更长久的时间。”<sup>39</sup> 找寻自我的努力，最终是为了用自我“返照人”<sup>40</sup>。在《潜渊》中，沈从文自认为是“对于美特具敏感”的“痴汉”<sup>41</sup>，而同时又指出这种对美的敏锐正是人类艺术史上的“伟人巨匠，千载宗师”的必备品质，从而悲哀于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只是“四平八稳”、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物<sup>42</sup>。而《长庚》虽形式与《烛虚》第五节、《潜渊》相近，都是采选日记式随笔组构成篇，但文中所表露的则更是对“他人”和“人事”的直接关注。因此，在关注沈从文的哲理思辨式思索时，并不能仅仅把目光放在沈从

<sup>35</sup> 沈从文：《短篇小说》，原载 1942 年 4 月 16 日《国文月刊》第 18 期，收入《沈从文全集》第 16 卷，第 502 页。

<sup>36</sup> 贺桂梅、钱理群等：《沈从文〈看虹录〉研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 年第 2 期。

<sup>37</sup> 参考解志熙：《爱欲书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收入解志熙：《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

<sup>38</sup> 沈从文：《烛虚》第五节，收入《沈从文全集》第 12 卷，第 21 页。

<sup>39</sup> 沈从文：《烛虚》第五节，收入《沈从文全集》第 12 卷，第 27 页。

<sup>40</sup> 沈从文：《烛虚》第五节，收入《沈从文全集》第 12 卷，第 28 页。

<sup>41</sup> 沈从文：《潜渊》，收入《沈从文全集》第 12 卷，第 32 页。

<sup>42</sup> 沈从文：《潜渊》，收入《沈从文全集》第 12 卷，第 33 页。

文的个体生命经验本身；而更应该看到，他是如何因过于“爱”这个世界而生出种种感慨与不安。沈从文并未陷溺于自身抽象思索的痛苦与悲观中，而是以“远景”为力量不断牵拉自己向上、向远行进，更好地直面当下“琐碎，懒惰，敷衍，虚伪的衣冠社会”<sup>43</sup> 并思考重造社会之途。

### 三、“理智”与“情感”的离与合：《烛虚》整体性的生成

如果再深究“悲悯”这一情感结构的形成，可以发现沈从文的“悲悯”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对于未来有某种期许与美好的想象；而当这种理想在反观现实时遭遇挫折、与腐败堕落等种种不合理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时，便会感到“可悲”而“可悯”。对于黑暗，沈从文固然心痛，却又能够因“远景”的牵引而从中“超拔”——与鲁迅“匕首”“投枪”式的斗争性杂文不同，“悲悯”在一定意义上削弱了沈从文杂文中本可以通过对现实的批判而生发的战斗力量，使批判以平和“建言”的面貌出现。

这种“情感”并不激烈、以思考者个体的“理智”为主导的“建言”式的杂文写作不仅是沈从文个人在昆明时期杂文写作的面貌，同时也是为抗战时期大后方许多学院派知识分子所共享的一种杂文写作形式。例如，1943年到1945年间，冯至就在《生活导报》《春秋导报》《中央日报》《自由论坛》等综合性报刊上发表了《认真》《一个希望》《似是而非的话》《空洞的话》《忘形》《书店所见》《两种态度》《读书界的风尚》《工作而等待》《方法与目的》《论历史的教训》《界限》《简单》《论个人的地位》《教育》《决断》等一批杂文。在1946年为《山水》所作的《后记》中，冯至这样回忆自己写作上述杂文的背景：“当时后方的城市里不合理的事成为常情，合理的事成为例外，眼看着成群的士兵不死于战场，而死于官长的贪污，努力工作者日日与疾病和饥寒战斗，而荒淫无耻者却好像支配了一切。我的写作兴趣也就转移，起始写一些关于眼前种种现实的杂文，在那时成为一时风尚的小型周刊上发表，一篇一篇地写下去，直到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才好像告了一个结束。”<sup>44</sup> 与这些写作类似的还有王力的随笔“瓮牖剩墨”与“龙虫并雕斋琐语”系列，虽名为“琐语”，其中许多文章也多有反映战时现实生活的诸多面向之处而近似于杂文。虽然对于具体现实生活的关注点有所差异，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杂文主要意在表达对他们所见的现实中不合理现象的反思，或正面“建言”，或以讽刺或反讽的手法揭露现实，表达不满。但无论是何种表达方式，这些杂文都并没有像以鲁迅及其追随者聂绀弩为代表的杂文那样的战斗性，而是相对更为静观，缺乏“情感”的烈焰。

不过，尽管这些学院派杂文表面上看来是在说理，以“理智”牵引出联想

<sup>43</sup> 沈从文：《烛虚》第三节，《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16页。

<sup>44</sup> 冯至：《后记》，收入冯至：《山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第96-97页。



与思考，其背后写作主体自身的“情感”倾向性仍然能从表面的“理智”下流溢出来。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这种“理智”与“情感”的杂糅，让两个《烛虚》各自生成了自身的主体性。从“烛虚”这一标题来看，也可以发现“向内”的深沉思索与“向外”的社会行动的整合。《烛虚》的第一、二节是最早以“烛虚”为标题发表的文章，因此要理解文题“烛虚”的含义，这两节尤为关键。两节在正文前均有小段引言。其中，《烛虚》第一节的引言，在初发表于《战国策》时，引言后标有“——岂明”，而实际上这段话正来自周作人1929年所作的《伟大的捕风》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表示自己很喜欢读《旧约》中《传道书》所谓“虚空的虚空”，及“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智识就加增忧伤”。不过，周作人并不完全认同“传道者”的看法，而是指出“对于虚空的唯一的办法其实还只有虚空之追迹，而对于狂妄与愚昧之察明乃是这虚无的世间第一有趣味的事”。而沈从文在《烛虚》中体现的态度也正与周作人相契合：尽管对世相的丑陋、现实的令人失望深有体察，却仍然要用思考与体察人事。正如《烛虚》之二的引言所言：“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烛如金。”<sup>45</sup> 可以看到沈从文的“烛虚”可谓“烛照虚空”，正是对“狂妄和愚昧”等虚无世相的察明，而写作则是沈从文用以察明世相并照亮生命、寻找生命更深处的价值的一种方式。在《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一文中，沈从文则将周作人《伟大的捕风》理解为：“本文说明深入人生，体会人生，意即可以建设一种对于人生的意见。消遣即明知的享乐，即为向虚无有所追求，亦无妨碍。”<sup>46</sup> 由此可知，“烛虚”之“烛照虚空”而“向虚无有所追求”的目的，也正在于深入、体会、建设人生。

如果把沈从文在1943年与1946年发表的三篇“新烛虚”<sup>47</sup>一同纳入考察范围，同样能够看到“烛虚”系列文章的某种整体性。《烛虚》与“新烛虚”基本都采取了“题记加正文”的行文方式：在《烛虚》与“新烛虚”系列文章的题记中，沈从文大都采取了一种玄想性的表达方式，如此，不论正文是讨论具体的社

<sup>45</sup> 沈从文：《烛虚》第二节，《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10页。

<sup>46</sup> 沈从文：《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原载1940年9月16日《国文月刊》第1卷第2期，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261页。

<sup>47</sup> 这三篇“新烛虚”分别是：1. 发表于1943年7月7日《民族文学》上的《找出路——新烛虚二》，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4卷。2. 发表于1943年3月27日昆明《生活导报》周刊第18期的《狂论知识阶级》，前面小引中提到“作新烛虚一”。这篇文章在《沈从文全集》第17卷中收入，题为《十六 读书人的赌博》，落款“三二年四月 改”，注释中说“本篇原载报刊不详”，原收入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年初版的《云南看云集》。这篇文章与解志熙发表在《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2期上的《沈从文杂文拾遗》中收入的《狂论知识阶级》一文相同。3. 1946年9月22日发表在《经世日报·文艺》第6期上的《新烛虚》，后改名《北平的印象和感想》刊于同年10月1日《上海文化》第9期，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2卷。

会问题，还是展开缥缈的生命追问，题记都为正文渲染了沉思的氛围，并为正文提供了充分的抽象空间。以《烛虚》第四节为例，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战国策》第8期上，后经过修改，又于1940年9月19日发表在香港《大公报·文艺》上。重新发表的《烛虚》之四删去了开头的一段题记式文字，并且对最后一段的议论进行了扩充。1939年，因昆明受频繁空袭的困扰，沈从文一家曾搬到昆明市郊的呈贡县乡下去住<sup>48</sup>，而所删去的这段引言也正用相当篇幅的笔墨描写了沈从文在呈贡乡居的风景：“家住呈贡，黄昏前独自到后山高处，望天末云影，由紫转黑。稍过一时，无云处天尚净白，云已墨黑，树影亦如墨黑，光景异常清寂。远望滇池，一片薄烟。在仙人掌篱笆间小小停顿，看长脚蜘蛛缀网，经营甚力。高大小[山]楂树正开花，香气馥郁。蜂子尚营营嗡嗡，不肯休息。”<sup>49</sup> 在这段对风景的观照中，那个二三十年代“看一切”的沈从文似乎又回来了。但紧随风景的观照之后的则是对人事的思索：“觉人生百年长勤，情形正复相似。捕蚊捉虫，吃吃喝喝，其事至小。然与生存大有关系。亦即十分庄严。但从这些小小生物谋生认真处看来，未免令人对于‘人’生悲悯心。因通常人总喜说为‘万物灵长’，脑能思索，手能发明，进步至不可思议。殊不知进步中依然处处尚可见出与虫豸完全相同处，即所思所顾，单纯而天真。终不出‘果口腹’‘育儿女’二事。有些方面且不如虫豸认真，未免可怕。”<sup>50</sup> 风景在这里所扮演的近似“起兴”的角色，随后的人事思索也仍然较为抽象，直到正文中，议论才与具体的人事如“读书人玩牌的嗜好”结合在一起，转入对当前现实而非抽象“人性”的思考。与此类似的是在1946年9月战争结束、沈从文回到北平后所作的《新烛虚》一文，此文开头摘取了沈从文1940年曾在昆明《中央日报·平明》上发表的《潜渊》一文开头的部分文字并加以修改扩充，作为正文的小引。以抽象为下文具体的“印象和感想”<sup>51</sup>作铺垫，题记与正文的张力关系展现了一种“向外”与“向内”相融合、“我思”与社会批判相联结的可能。

题记的抽象性与或沉浸于抽象思索、或关注具体显示的正文之间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提示出沈从文试图在自我与世界之间自由游走，既通过世界把握自我，又通过自我理解世界。如此，因“向远景凝眸”而对当前的人世产生的“悲悯”观照方式，将建言性杂文中的“理智”与“情感”、《烛虚》与“新烛虚”系列文章中的抽象题记与驳杂正文各相串联，各自生成了分别作为文集与文章的两个《烛虚》的整体性。而这种“悲悯”人世与用“远景”超拔自我的线索，也在一定意义上为我们看待沈从文在昆明时期《看虹摘星录》《七色魔》等文本中

<sup>48</sup> 参考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6-217页。

<sup>49</sup> 上官碧（沈从文）：《烛虚》，1940年7月15日《战国策》第8期。

<sup>50</sup> 上官碧（沈从文）：《烛虚》，1940年7月15日《战国策》第8期。

<sup>51</sup> 《新烛虚》最初于1946年9月22日发表在《经世日报·文艺》第6期上，后改名《北平的印象和感想》刊于同年10月1日《上海文化》第9期（参见前注）。

难解的自我矛盾性<sup>52</sup>，提供了一种整观的可能。

（作者简介：李煜哲，女，（1995—），汉族，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

<sup>52</sup> 解志熙在《爱欲书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中指出了抗战爆发以来的两个沈从文：一个是公开亮相的沈从文，是坚定的爱国者和自由主义者；另一个则是“非常内向而且特别敏感的浪漫文人沈从文”；这两个形象的差异被许杰评价为“人格破裂”（第61-65页）。